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六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人民作家西戎

杜学文 著



西戎是“山药蛋派”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我国农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同时，他长期在编辑岗位工作，特别是长时期主编山西省文联和作协机关刊物《火花》《汾水》，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王灵善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6辑)

人民作家西戎

杜学文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00千字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34—80—7
G·11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巍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从西坡村到吕梁剧社	(1)
二、两度延安学习	(4)
三、最初成果	(9)
四、与马烽同谱《吕梁英雄传》	(13)
五、南下成都	(18)
六、重返故土	(23)
七、“中间人物论”的样板	(33)
八、老树新花	(38)
九、九死一生	(43)

引 子

西戎是“山药蛋派”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我国农村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同时，他长期在编辑岗位工作，特别是长时期主编山西省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火花》《汾水》，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从西坡村到吕梁剧社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县西坡村。蒲县位于吕梁山南部，土地贫脊。西坡村是一个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连一个地主与富农也没有。西戎家有三十多亩地，二十多只羊。凭着父母的勤劳节俭，在正常年景下日子还能过下去。遇到饥馑之年，也不免忍饥挨饿。西戎6岁开始上学，每天要往返十余里到西坡村附近的化乐镇。他天资很好，也很用功，一些语文习作常常受到老师的赞赏。他在蒲县高等小学教书的本家哥席道正见他作文写得相当好，就带他到县高小读书。西戎自然非常高兴。

席道正曾经在省城太原上过大学，是一位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在蒲县读高小时阅

读了鲁迅的许多小说。虽然他幼小的心灵对鲁迅犀利深沉的文笔还缺少理解,但润土、祥林嫂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他感到这些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许多村里的人就是他们的化身。少年西戎对鲁迅先生关于故乡、关于乡村的描写极感兴趣,特别是对过年祭祀、社戏中热闹场景的描写更是使他百看不厌。在那段求学期间,西戎还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此外,西戎在席道正的影响下,还喜欢上了戏曲。是剧团的票友,常带西戎到剧团看戏,因而从小就培养了西戎对戏曲的兴趣。他一有空闲就喊两嗓子,听说什么地方演戏,十里八里山路不当回事,锣鼓不停不离开场子。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1936年2月,为了推动全国人民的武装抗日,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赴冀察前线。红军东渡后,在山西撒下了抗日的火种。1937年7月,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蒲县活动,对少年西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些战士身穿军装、肩背斗笠,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到处宣传抗日,进行文艺表演,使这山高沟深的吕梁山南麓一下子沸腾起来。在这期间,西戎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看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一系列号召民众抗战的戏剧。红军的到来,为西戎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使他可以看到山外的世界,体验到了另一种生活,

这也是西戎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红军的队伍，使他还幼小的心灵中，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最初浅的认识。不久，西戎接到了中学入学通知。但由于日寇的入侵，国民党阎锡山军队节节溃退，学校停办了。上学，对他来说已不太现实。就在此时，他认识了蒲县牺盟会的工作人员王以林。

1936年，在山西的一部分左派进步青年如宋劭文、戎子和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倡议成立一个抗日救亡团体。阎锡山准其所请，在太原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并自任会长。不久，阎锡山请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不久的薄一波回省工作。薄一波、杨献珍等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使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首先在太原地区实现。这年冬天，为了给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薄一波提出招收部分青年学生，派往各县作牺盟会的宣传员。王以林即是蒲县牺盟会工作团负责区上工作的队员。他是东北沈阳人，“九·一八”后流亡到关内，从事抗日活动。王以林给西戎讲日寇在东北的暴行，讲全民抗战的道理，并告诫西戎，年轻人，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还是要找出路。最好，就是到延安去上学，那里有抗大、陕北公学。暂时去不了，就留在县牺盟会工作团工作。于是1938年4月，年仅16岁的西戎，参加了革命，掀开了他人生的崭新篇章。

当时负责蒲县牺盟会工作的是傅东岱同志。傅东岱，原名傅尚普，1916年生于河南新安县。河南求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同学发起组织文艺社团，编辑出版抗日报刊，撰写诗文，号召抗日，并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道

理,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话剧。1938年1月离开家乡,来到山西,参加了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纵队。在调任蒲县牺盟会秘书,负责蒲县牺盟会工作期间,傅东岱筹建了蒲县的文艺工作团,西戎即参加了该团。

1938年7月,日军占领了临汾等地。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巩固吕梁根据地,当时的洪赵中心区党组接受了洪赵中心区组织部长林杉同志的建议,决定组建吕梁剧团。11月,吕梁剧团正式成立。1939年又与蒲县、永和等地的文工团合并,改为吕梁剧社。西戎也因此成为吕梁剧社的一员。当时剧社的演出任务,剧团成员十分频繁,为完成演出任务,一天要走几十里地,有时一天吃两顿饭都难以保证,冬天甚至穿不上棉衣。但是大家毫无怨言,情绪高涨。先后演出了《中华儿女》《农村曲》《胜利》等话剧、音乐剧以及《黄河大合唱》等。由于剧社成员多为小学文化程度,剧社领导林杉、王江三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在革命队伍里,西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两度延安学习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一个关于“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议案,决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同年3月至6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军

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制定了“限共反共”的基本政策。此后，阎锡山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加剧国共两党的磨擦。同年12月，国民党向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捣毁机关，杀害干部群众，抢走武器装备，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使八路军、决死纵队的数百名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杀，形势急转直下。

作为牺盟会洪赵中心区领导的吕梁剧社在“十二月事变”前，已为反动派所注视，处境困难。又加上日寇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大扫荡，使剧社经费中断，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剧社领导决定西渡黄河，到陕西去。在当地抗日群众的帮助下，西戎随同吕梁剧社冲破了阎锡山的严密封锁，顺利渡过黄河，到达了陕北的延川县。

剧社到达陕北之后，曾在延川、绥德等地演出抗日剧目。尽管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对演出破坏干扰，但剧团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一些群众团体主动资助剧社小米、食油和蔬菜。在绥德演出时，剧社受到了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王震将军和359旅将士的热情款待。王震将军根据当时的形势，介绍吕梁剧社到延安学习、休整。

1939年11月，吕梁剧社成员历经千难万险，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安排在桥儿沟村。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化院(简称鲁艺)就在这里。西戎和剧社的战友们在这里，主要进行业务学习。剧社组织大家到鲁艺以及桥儿沟附近的其他文艺团体上课，也请鲁艺的教师到剧社辅导讲课。此外，还欣赏了鲁艺演出的话剧《日出》女大演出话剧《秋瑾》、中央党校演出的苏联话剧《破坏》以及电影《夏伯阳》《列宁在十月》

等。他们还参加了由中央党校举行的五百人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1940年2月初，延安各界在北门外广场上举行“延安民众讨汪（精卫）大会”，西戎和剧社的同志们参加了这次大会，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不久，有消息传来，阎锡山在山西搞了“十二月事变”之后，我党迅速发动的反顽固斗争取得了胜利。上级决定，吕梁剧社返晋。1940年4月，吕梁剧社回到了晋西北的首府兴县。

剧社一到兴县，即吸收了原属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的青工剧团，并投入了当时为庆祝晋西人民反顽固斗争的胜利和晋西北行政公署的成立而举办的“红五月文艺汇演”（即“五大汇演”）。在林彬同志主持下，剧社排演了话剧《胜利》《小叛徒》等剧目。西戎曾在《小叛徒》中扮演政工干部。此外，吕梁剧社还首演了由傅东岱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牺盟会大合唱》。这部作品是傅东岱同志在延安时期，根据我党领导的牺盟会的工作情况创作的。歌词写成之后，他交给冼星海同志去作曲。仅用一天时间，冼星海就完成了这部作品，被人称为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之一。这部作品几乎同时在兴县和延安上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期间，西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五月文艺汇演”结束后，西戎随吕梁剧社去第八军分区即决死二纵队进行慰问演出，其间参加了反扫荡，经历了木前塔遭遇战的严峻考验。不久，上级决定，吕梁剧社正式划归决死二纵队建制，并与二纵队所属的黄河剧社合并，仍然沿用“吕梁剧社”的名称。这次合并，也是来后被称为“晋绥五作家”的首次汇合，即原吕梁剧社的西戎、胡正和原

黄河剧社的孙谦、李束为、马烽都聚到了一起。时“八一”将至，剧社赶排了余平若的话剧《新的征途》以及黄自的《旗正飘飘》等合唱节目。八月中旬，我军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吕梁剧社也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西戎和战友们四处书写标语，向群众进行宣传。剧社还演出了马烽同志创作的街头话剧《押送俘虏》等。“百团大战”整个战役还未结束，因前线战斗频繁，剧团行动不便，上级命令剧社第二次赴延安学习。

1940年10月，西戎随吕梁剧社，经过10天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桥儿沟。在《我迈出的第一步》中，西戎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他这次在延安学习的经历：

1940年冬季，吕梁剧社奉命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学习。剧社领导很想让我们这批“青干”都能进鲁艺学院深造。有如此良好的机会，我当然是巴不得的。可是测试结果，大失所望，年龄小当然也算未能录取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基础水平太差。一个高小毕业生，只在宣传队跳跳蹦蹦干了两年，怎么可能一下子跃进高等学院去呢！幸好，上级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急切，便在鲁艺学院附设了“部队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学习了半年。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主办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了，部队干部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便并入部队艺术学校。从此，我才真正获得了从头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艺术修养的深造机会。年龄稍大了一点，便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部艺学习的两年里，我不敢懈

怠，上课认真听讲，课外认真读书。白天坐在山坡上，夜晚爬在油灯下，我贪婪地读着我所能借到的中外名著，逐渐地眼界开阔了，懂的东西也多了起来。但是越学，反而越感到自己的知识浅薄，因而学习更是倍加卖力。这当儿，我也暗自考虑将来的前途问题，该向什么专业发展？当演员，我的个头矮小；学美术，缺乏素描基础；学音乐，嗓子也变坏了，光会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来想去，自觉对文学比对其他专业兴趣更浓。于是，我便练习着写歌词、诗和小故事。这些习作，有的发表在自办的《生活》墙报上，有的送给音乐班的同志谱曲。我的一首歌词《送公粮》，由张朋明同学谱成曲子，曾被边区政府选用，这件事，又给我搞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点信心。于是，我便日夜地爬在被子卷上写呀写。有一次，我竟然写成一篇反映敌后反扫荡斗争的小说，大胆地送给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天蓝同志，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称赞。从此，我对写作更爱得入迷，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除《生活》墙报和《连队生活》上用了几篇外，还没有一篇能够在大报刊上发表，因为我还鼓不起向外投稿的勇气来。

三、最初成果

新的环境，给年轻的西戎带来了新的生活。那时的延安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之风，以此表示自己与旧我决裂，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当时吕梁剧社有一位文化教员高羽，在晋西北时曾给西戎等人讲授过近代革命史、“五四”运动和鲁迅作品等。西戎便请他为自己改名。因为西戎是山西人，生在西坡村，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放弃了学业，参加了革命队伍，亦可谓“投笔从戎”为救国，因而高羽便由当年的席诚正改名为西戎。从此，“西戎”便成为青年席诚正投身革命，追求幸福光明的标志。

1942年春末，西戎在部队艺术学校学习结业，和吕梁剧社的其它同志一起被编入一二〇师所属的战斗剧社，在编辑股任编辑。西戎自以为缺乏写剧本的把握，决定先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一些战斗故事，以宣传抗日。于是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窑洞的山坡上，他将自己曾经参加过的木前塔遭遇战中的经历进行了艺术加工，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1942年10月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的发表，对西戎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前他虽然也写过许多东西，但都不是在正式报刊上发表，只是刊登在自己办的墙板和油印刊物上，影响较小。而《解放日报》是当时在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其影响自然比油印刊物要大得多。同时，这篇小说的发表，也

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它成了西戎日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发轫之作。用西戎自己的话来说，“这件事，本不足为奇，而对我这个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的青年人来说，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进了文学队伍的行列，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戎《文学路上五十春》）

1942年冬天，边区开始实行精兵减政。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也将所属的编辑股、美术股的大部分同志精减，只保留下了戏剧股和音乐股。西戎、胡正、马烽等人均于此时离开了部队，于1943年1月从陕甘宁边区返回晋绥边区，到一二〇师政治部招待所报到，再由师政治部介绍到地方分配工作。据胡正在《林彬与吕梁剧社》一文中回忆：

我在工作无着、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原吕梁剧社的西戎等人，到黄河岸边的张家湾村，看望了当时是晋西大众剧社社长林彬老师。他先以黄河岸边的红枣亲热地接待了我们，然后又留我们吃饭，而且用他不多的津贴让伙房加了几样当时很难吃到的肉菜。他了解到我们遇到困境后，当即给原晋西文联主任，精简后合并于晋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文化部长亚马同志写了信，推荐我们到文化部新组建的文工团。我们高兴地怀着新的希望，急匆匆走了20多里路，到了西坪村，亚马同志和文工团负责人、原晋西文协主任卢梦同志接纳了我们，使我们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当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开过不久。毛泽东同志的《讲

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晋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文化部长亚马同志和原文协负责人、晋西北文化部文工团负责人卢梦同志根据笔记向西戎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使他们这批刚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西戎和其他同志一起，接受组织安排，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西戎被分配在晋西北第二军分区所辖保德县第四区抗联任文化部长。这里，从整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来说，称作内地，其实距日军据点也不过百十余里，随时都有被敌人“扫荡”的可能。西戎一报到，便脱下了从延安穿来的军装，换上了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腰扎腰带，脚穿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哪里有工作，就到那里。除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以外，诸如当地群众的兄弟分家、婆媳吵架、换贴立约、写信谈心，事无巨细，都要认真处理。在工作中，西戎开始尝到了纷繁生活的乐趣，常常产生创作的冲动，陆续写出了《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受苦的日子算完了》等小说、通讯、散文等，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晋西北的《抗战日报》等报刊上。这一段经历对西戎了解农村，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也为他在参加革命后重新认识中国农民，思考中国的命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44年，为了配合当时的减租减息运动，晋绥边区领导同志要求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这方面的秧歌剧剧本。西戎和卢梦、孙谦、常功四人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保德县第四区期间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真实具体的生

活素材。他和其他几位同志讨论人物性格、情节结构，写出了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又名《减租生产大家好》。剧本完成后，立即在晋西北根据地上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仅据“七月剧社”的演出统计，就超过了100场，观众达20余万人，成为当时吕梁地区备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据杨戈《关于〈王德锁减租〉》一文介绍：

《王德锁减租》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应当说在我们边区的文艺创作中，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收获。它很全面地反映了减租政策的整个执行过程，及边区人民在民主生活中的丰富的斗争事迹。它表现了民主政权的政策的群众性，群众怎样掌握了这个武器，怎样组织了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又如何改造了动摇者，巩固了自己的队伍，争取了对方的力量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伟大的群众斗争中，如何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它没有一句抽象地提出共产党如何伟大，但它无处不是具体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共产党用怎样深入的领导力量，去改造社会和人类。所以它给人的感奋，不是抽象的几句话说得出来的，而是一种要求行动的力量的鼓舞；因此它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能给观众以深刻的教育。剧中贯穿着一个斗争性不强的农民王德锁，如何在群众斗争中，在农会的教育帮助下坚定起来。因此，它首先可以使王德锁类型农民得到教育。王德锁类型的农民，在我们根据地曾是很不少的，他

们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但他们常具有旧社会所给予他们的软弱性和散漫性。作者的确抓住了王德锁的思想深处,而且把它用具体行动和人物之间的斗争明显地表现出来。

冯牧也认为“这个剧本谁都会看出它是为配合当地的减租运动而写成的。但是,不论谁看了它,都会承认,这个戏不但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着不下于前者的艺术标准的。这是一个艺术品。作者为我们绘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号来说明主题的中心,而是通过了人物的形象来表现出当前现实,通过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来说明减租运动的重要及其解决的道路。”(冯牧《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由于这部作品关注现实,及时、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减租减息运动,对减租减息起了推动作用,因而获得了晋绥边区在纪念“七七”事变七周年之际举办的“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戏剧类甲等奖,并受到了贺龙同志的好评。

四、与马烽同谱《吕梁英雄传》

1944年秋,西戎被调到《晋西大众报》社做编辑。《晋西大众报》于1940年10月26日在兴县创刊,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主办的面向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通俗报纸。1945